



鼓楼史学丛书·区域与社会研究系列

晋西北根据地 互助合作运动研究

1940-1949

贺文乐 著

A Study of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Movement
in Northwest Shanxi Base Area (1940-194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鼓楼史学丛书·区域与社会研究系列

晋西北根据地 互助合作运动研究

1940-1949

贺文乐 著

A Study of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Movement
in Northwest Shanxi Base Area (1940-194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晋西北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研究: 1940 - 1949 / 贺文乐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 - 7 - 5203 - 0454 - 2

I. ①晋… II. ①贺… III. ①农业生产互助组—研究—山西—
1940 - 1949 IV. ①F32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550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0. 75
插页 2
字数 308 千字
定价 89.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山西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资助

目 录

绪言	1
一 研究缘起	1
二 研究区域与对象	3
三 学术史回顾	6
四 资料来源	21
五 研究方法与思路	23
六 创新与不足	25
第一章 传统社会中的革命	28
第一节 革命前的晋西北乡村社会	28
一 自然生态	28
二 社会生态	31
三 传统的互助合作模式	40
第二节 中共势力嵌入晋西北与革命的发生	53
一 革命政权的建立	53
二 初期经济动员与乡村秩序重构	57
第二章 互助合作的发展阶段与组织程度	67
第一节 保守阶段（1940—1942 年）	68
第二节 激进阶段（1943—1945 年）	76
第三节 曲折阶段（1946—1949 年）	91
第四节 个案分析：偏关县 39 个中心自然村的考察	108

第三章	互助合作的动员机制	115
第一节	动员方式	116
一	民主政府动员	116
二	基层社会动员	127
第二节	动员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134
一	偏差的表现	135
二	出现偏差的原因	143
三	偏差的纠正	147
四	启示	151
第三节	互助合作中群体心理之分析	152
一	基层干部群体心理的深描	152
二	农民群体心理的泛化	156
三	利益驱动下群体心理的革命化	161
第四节	个案分析：偏关县、岢岚县、兴县	165
一	偏关县	165
二	岢岚县	171
三	兴县	175
四	小结	179
第四章	互助合作的组织模式	181
第一节	互助合作的组织原则	181
第二节	传统互助合作模式的传承与演变	184
第三节	新式互助合作模式的发展	192
一	耕作方式的转变	192
二	劳力与武力结合	195
三	合作农场	205
四	变工合作社	209

第五章 互助合作的运作机制	217
第一节 纪律条规	217
第二节 领导人选	228
第三节 记工、折工与还工制度	231
一 记工	233
二 折工	239
三 还工	241
第六章 互助合作的效果与局限	246
第一节 互助合作的效果	246
一 经济方面	247
二 政治方面	254
三 军事方面	259
四 社会方面	264
五 农民性格的重塑	274
第二节 互助合作的局限	277
一 “路径依赖”面临的困境	278
二 “合作社模式”的弊端	283
结语	288
一 中共整合乡村资源视角下的互助合作	289
二 民众参与革命视角下的互助合作	295
三 互助合作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299
参考文献	301
后记	322

图表目录

图 0-1	晋西北革命根据地局部图	4
表 1-1	晋西北 7 县农户耕地占有情况	36
表 1-2	晋西北 7 县人均耕地占有情况	37
表 2-1	晋西北 7 县互助组组织情况	70
表 2-2	1944 年河曲、保德两县“组织起来”百分比对比	82
表 2-3	兴县、河曲、保德、偏关 4 县部分村庄“组织起来” 统计一览	83
表 3-1	临县二区桦林村变工队成员土地增加情况	118
表 3-2	临县二区桦林村变工队成员阶级成分变化情况	119
表 3-3	岢岚县五区各阶层受贷统计	120
表 3-4	岚县阴寨村 1943 年各阶层生产统计	162
表 3-5	岚县阴寨村 1944 年各阶层生产统计	162
表 4-1	岢岚县 1945 年春耕变工组耕作方式统计	195
表 5-1	临南县马家岭村变工组组长个人情况统计	231
表 6-1	临县 1944 年扩大耕地面积统计	248

绪 言

一 研究缘起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厉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倡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在集体化时代曾一度被取缔，其复兴的史实再次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并非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当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生产力本身承载能力的时候，这样的变革会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个体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存在不仅适应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现，更是传统稳定性对集体化抵制的内在反映。孕育于个体经济之内的传统互助合作模式，似乎因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为当今社会所关注。

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人已认识到：“中国农村经济之崩溃，其主要之原因由于生产之不丰，但农村合作之不发达亦足以影响于农村经济也。……农村合作之意义，便是在农村社会中以解决农村经济问题为目的底合作组织。……农村合作是救济农村衰败问题的唯一良善办法。”^① 新中国成立前互助合作运动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等民主政府所普遍提倡，而且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不少学者甚至将互助合作认定为农业集体化的发展源头。“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观察历史的重大转变，看历史对象是否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核心问题，看它是否影响或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

^① 翟克：《中国农村问题之研究》，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 1933 年版，第 322 页。

走向和历史命运。”^①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的实践，不仅从经济层面为根据地的存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从政治、军事、社会乃至思想层面成功改造农民，动员其积极参与民族之战、民主之战。在这一重大革命历程中，革命化的农民和乡村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合法性权威的关键因子，而且为后来推行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准备了先决条件。换言之，互助合作不只是一项战时经济变革，而且是渗透到社会各方面的全面动员和改造，对后来新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制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就历史发展进程而言，从互助合作到集体化是已逝历史的延续。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旧中国农村传统的封建因素正在被“革命话语”下的民主与进步因素所替代，农民自由、散漫、自私的心理也逐渐演化为带有强制色彩的集体主义思想。在从传统走向革命的过程中，互助合作运动成为改造乡村传统和建立革命秩序的桥梁。这主要体现为：它一方面吸收了传统互助合作模式中较为积极的因素，保留了个体经济和部分地满足了农民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另一方面则将农村社会相对分散的生产资料与社会资源进行较为合理的整合，不仅提高了农民物质生活水平，而且逐渐将其自私心理改造为革命化的集体理念，进而使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建立了合法性权威。随着合法性权威在农民内心深处的固化，多数农民不再对革命表示怀疑，而是义无反顾地走向革命的浪潮之中。

对于这一段历史的描述，似曾为集体化的大潮所淹没。其实，从互助合作到集体化，并非一路凯歌。言外之意，以往认为互助合作直接可以向集体化过渡的“线性”史观理应为“复线”史观所取代。因为“过去并非仅仅沿着一条直线向前延伸，而是扩散于时间与空间之中，历史叙述与历史话语在表述过去的过程中，根据现在的需要来收集摄取业已扩散的历史，从历史中寻找有利于己的东

^① 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

西”^①。本书的研究亦有此意，它不仅有利于人们了解传统互助合作模式与中国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内在原因，而且也为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闲置劳动力的安置问题给予深刻的启迪，并启发人们思考国家行政力量与农民传统之间相互博弈的复杂过程。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读是本研究的现实关怀所在。

二 研究区域与对象

历史学研究离不开研究区域与对象的选择，因为“历史学的目的是认识客观必然性（‘世界性’）的实际表现，亦即揭示其多样性（‘地区历史的’）”^②。要想揭示晋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表现，必须首先对其进行多方位的界定。晋西北地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主要指山西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大体涵盖今忻州市、朔州市的全部和大同市、吕梁市的部分地区，包括河曲、保德、偏关、神池、岢岚、五寨等 20 多个县市。^③也有学者认为晋西北地区“行政范围包括左云、右玉、平鲁区、朔城区、河曲、偏关、保德、神池、五寨、山阴、岢岚、兴 12 个县”^④。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晋西北地区主要是指西临黄河、东抵同蒲铁路、北达内长城、南至汾离公路的广袤三角区域。该区面积高达 6 万多平方公里，管辖仅有 350 万人口的 35 个县。^⑤本书则以晋西北行政公署所属二、三、六分区为主，即河曲、保德、偏关、岢岚、神池、五寨、临县、临南、离石、方山、宁武、静宁、忻、崞共 14 县（见图 0-1）。

① [美] 杜赞奇 (Durara Prasenjit):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高继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 页。

② [苏] M. A. 巴尔格: 《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莫润先、陈桂荣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8 页。

③ 苏志珠: 《人类活动对晋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影响的初步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 年第 4 期。

④ 朱东红: 《晋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03 年，第 6 页。

⑤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 页。

“革命与传承”的论纲下，笔者试图透过已有研究的表象来细析革命发生与传统承接之间的内在关联。其次，晋西北处于晋、绥、陕三省交界地带，省际商品交流较为频繁。这一区域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的频繁，有助于从另一层面解读革命发生的隐性缘由。因为晋西北乡村既不属于黄宗智眼中“分裂了的村庄”^①，亦不属于完全封闭的共同体。晋西北经济滞后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二者相互交融的结果。最后，基于个人因素的考虑。区域社会史的力行者行龙指出：“开展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研究者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生于斯、长于斯的相对区域开展研究。这样既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基本条件，又有切身体会和领悟的实践。”^②对于笔者而言，晋西北这片熟悉的土地，激发了笔者研究的情趣。

由于“在历史叙事中，事件的时间标志是确保历史叙事真实性的一个重要叙事策略”^③，所以对时间范围的限定也很有必要。法国年鉴派史学家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把历史时间划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三种“时段”，并提出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即“结构”“局势”“事件”。他认为：“结构”是指长时间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一些因素，但在历史上起经常性、深刻性作用；“局势”是指在较短时期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性和节奏性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事件”则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在这三种“时段”中，长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自然、经济、社会的“结构”，“局势”的变化对历史进程起直接的重要作用，而“事件”只是社会震荡中掀起的浪花，对历史所起作用甚小。^④根据

① [美] 黄宗智（Philip Huang）：《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79—283 页。

②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49 页；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9 页。

③ 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载杨念群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73 页。

④ [法] 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1 卷），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7 页。

布罗代尔的理论,对于革命史的研究应该使用“短时段”。但考虑到中共势力嵌入晋西北地区并非突发性的“事件”,而更接近于“局势”的变化,本书拟使用“中时段”。以1940—1949年为时限,力图以该时段内晋西北革命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历程来安排行文构架。

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共势力嵌入晋西北乡村社会后的互助合作运动。关于“互助合作”这个概念,目前学界并无标准的诠释。从字面意思来看,“互助合作”是相对个体的、单一的生产劳作而言。在本书中,它既不同于传统的互助合作模式,也不同于从西方引进的“合作”以及中共经济政策中的合作化、集体化。笔者认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乡村社会,“互助合作”既包括以“变工”为主要形式的农业互助合作模式,亦包括以农副业结合的变工合作社、单一副业为主的合作社、带有初级社会主义色彩的合作农场乃至随战争而生的“劳武结合”等。

三 学术史回顾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演进的过程中,一些先后造访延安及其他根据地的中外记者就曾以时事报道或文学叙事的形式对互助合作这一改变根据地乡村社会的重大经济运动进行过评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形势的骤变,西方学者对中国革命的相关研究趋于停滞。同时期国内的研究则基本以传统革命史观的论调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寻根问源。六七十年代后,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西方学者试图通过有限的资料以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共革命获胜的原因。到了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后,学界的研究渐趋于微观的分析。近些年来随着相关革命历史档案的相继被挖掘以及新观念、新方法被大量的采纳,学术界对互助合作的研究日渐兴盛起来。

(一) 亲历者的革命叙事

20世纪40年代,不少西方记者和西北考察团详细记载并报道了大量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生动地描述了太行边区农民劳动互助的

情形，认为变工队“充分发挥了集体劳动和私人所有权这两方面的积极性”^①。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对陕甘宁边区的互助合作给予充分的肯定，甚至将之视作美国农场中联合收割的生产方式，而吴满有等劳动英雄则成为引领中国社会走向民主与富强的力行者。^②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el Epstein）则以激昂的文字描绘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农民进行互助合作的真实画面，并且指出走互助合作之路是农村闲置劳动力的正确选择。^③ 英国记者斯坦因（Gunther Stein）在目睹陕甘宁边区吴家枣园吴满有领导的变工队后发现：“边区的每一个人都以变工队而自傲”，认为：“共产党从年老的农民那里学到了这个，把它精制了一下，配上了许多宣传的东西，再交还了农民。”言外之意，斯坦因强调了中共利用农民互助合作传统将其成功置于政治动员之下，进而达到革命的目的。^④ 在美国著名进步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ana Louise Strong）的眼中，中共扩大传统互助合作模式的范围，不仅体现在农业方面的互助合作，而且副业方面的互助合作亦得到普遍的推广。新式互助合作模式，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解决了农民食粮问题，而且在教育、文化等方面改善了农村的生活面貌。尤其是选举劳动英雄参加的劳动英雄大会，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组织形式。在副业方面，纺织合作社的建立，不仅解决了农民的穿衣问题，而且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使妇女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互助合作还培养了农民的集体主义精神。这一点，在抗灾、修路等规模较大的工作方面得以体现。因之，她认为根据地的农民，

① [美] 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154页。

② [美] 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北行漫记——红色中国的报道》，陶岱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63—74页。

③ [美]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el Epstein）：《中国未完成的革命》，陈瑶华等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289页。

④ [英] 斯坦因（Gunther Stein）：《红色中国的挑战》，李凤鸣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5—77页。

已经成为独立的劳动者，成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新型农民。^①

英国记者柯鲁克夫妇于 1947 年 12 月到达晋冀鲁豫边区十里店村，以“解剖麻雀”的精神观察和记述了中共领导下边区农民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他们认为由于坚持政府政策引导与农民传统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坚持走群众路线，合作社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经济条件（如通过发展贸易和运输增加农民收入），而且提高了其政治觉悟（如积极配合工作队及农会的相关工作以达到“翻身”的目的）。他们还发现，对于传统的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中共采取“从群众中来，然后将其上升到较高水平，再回到群众中去”的办法。此办法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干劲，而且吸引了除贫农以外其他阶级的参与，尤其是妇女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增强了其要求获得与男人同等地位的信念。^② 美国人韩丁以土改工作队观察员的身份于 1948 年参加了晋冀鲁豫边区张庄村的土改与整党运动，在与农民长时间的生活交往中，他目睹了农民互助合作的实践过程。首先，他发现在干部的动员下，张庄村农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是人们从未经历过的”。他甚至认为“能不能把蒋介石轰出南京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运动能不能持续地发展”，也就是说，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生产运动是决定内战胜负的重要因素。其次，他认识到变革封建生产关系尤其是变更地权对激发农民参与互助组的推动作用。最后，他认为中共虽然延续了农民的传统，但是大量互助组的出现是“组织和推动起来的”，甚至一些大组的出现是干部强制的结果。不少干部的“极端主义”，导致一些互助组成为“执行政府公差、分配救济物资、管理生活而与生产很少联系的半官方机构了”^③。

此外，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 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

① [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Aana Louise Strong): 《中国人征服中国》，刘维宁等译，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23—134 页。

② [加] 伊莎白·柯鲁克 (Isabel Crook)、[英] 大卫·柯鲁克 (David Crook): 《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龚厚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2—64、78—87 页。

③ [美] 韩丁 (William Hinton): 《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惊译，北京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38—250、618—625 页。

中充分肯定了中共在陕北动员民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指出：中共通过“强大的宣传运动和教育强制”，使包括二流子、妇女及部队等过去不事生产的这类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成为生产者”。他认为利用农民传统互助合作模式建立起的“变工队”在受到农民普遍欢迎的同时，也提高了劳动效率。^①

在同一时期，国内记者也对中共领导下敌后根据地军民互助合作生产的实况进行了描述。著名记者穆欣通过收集农民互助生产、民兵劳武结合式生产与战斗的丰富材料，记述了晋西北革命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的真实情况，充分肯定互助合作在整合根据地经济、社会乃至抗击日本侵略者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历史作用。^② 作为中外记者团成员之一的赵超构认为变工队不仅在生产上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具有一种政治意义：“它打破了束缚农业发展的个体劳动，养成他们集体劳动合作互助的习惯。等到农民们逐渐了解集体的好处，就可以进一步提倡集体化的农业经营，而走到工业化的集体农场的道路。”^③ 对于另一种互助合作组织——合作社，他从五个方面肯定其经济作用，即吸收民间游资、包办民间商业、控制民间副业、帮助人民就业以及沟通公私经济关系。^④ 即便是为国民党反共制造社会舆论的另一位中外记者团成员——重庆商务日报记者金东平造访延安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共以“透过民族形式”的宣传与树立典型人物去领导变工队、扎工队、运输队的方式，成功地组织民众生产与补给部队兵源。当然，他认为互助合作“实际上则是变相的将人民加以控制并榨取其过分的劳力”的观点有待商榷。^⑤

这些亲历者的观察，可以说对中共领导的互助合作运动进行了

① 转引自〔美〕约瑟夫·W. 埃谢里克（Joseph W. Esherick）《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 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罗清、赵仲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88—189页。

② 穆欣：《晋绥解放区鸟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82、97—113、231—319页。

③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96—197页。

④ 同上书，第199—200页。

⑤ 金东平：《延安见闻录》，民族书店1945年版，第85—87页。